

凡是写文章的人,几乎都知道“文章不厌千次改”的道理。今日用电脑写作,现代化的写作工具也给写文章的人提供了对文章进行“千次改”的便利。但是,据我所知,当下的写作者,改文章的心力却是越来越小了。笔者从事出版工作多年,接触过一些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也听到国内一些编辑关于当下写作者不怎么改文章的说。当下从事编辑工作的同仁几乎都有这样的看法:今天,如果你去约谁写一篇、一部无论什么东西,不难;但是,如果你请谁把他的文章、著作改一改,那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总见到他的不安。有不下次,他总是祥林嫂一样反反复复念叨《太白醉剑》有几处应该改一改的地方而没有来得及改,好像那几处没来得及消灭的“狼”真的会吃掉他的孩子。临到出版这部已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诗圣杜甫》时,他乐此不疲的修改可就苦了去了。记得有一次要吃午饭的时候,他满脸苦楚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大哥,改不动了。但觉得还是不行。总觉得杜甫有点儿不像。我问他哪儿不

这里,我不得不说给《诗圣杜甫》审读、把关的两位老先生。一位是文学研究专家孙荪,一位是杜甫研究专家葛景春。两位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眼格之高可谓了得。就《诗圣杜甫》而言,交给这两位先生把关可谓是自己出了道难题。针对长篇小说《诗圣杜甫》,孙先生要的肯定是文学性的高度,而葛先生要的肯定是历史的真实。作为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对象的文学作品,若要使二者都达到一定的高度,那

只眼擦得那么亮呢? 韬光是不幸的,自找的把关老师把关过严。韬光又是幸运的,他遇到了有真才实学乐于奉献的严师。不用我说,韬光自讨苦吃的求师给他的作品修改带来多大难度,我想大家自会揣度得出。在韬光修改作品的过程中,据我所知,他还几度请教诗坛泰斗屠岸先生,请教长篇历史小说大家二河先生、唐浩明先生,请教了小说创作上成就卓然的贾平凹、周大新、李佩甫、郑彦英、李洱先生,请教了著名学者王立群、耿占春、高有鹏、刘道光先生,还有河南杜甫研究会诸位同仁也提出了诸多建议。当然,先生们的意见和建议不一定是神示,不一定非照此“办理”不可。但仅是心里想一想,斟酌一下,也够韬光费神耗力了,更何况我所知的韬光对每一位先生的意见又是那么认真虔诚的听取并着力消化呢?

● 书林漫步

文章是改出来的

——读程韬光长篇历史巨著《诗圣杜甫》 单占生

像?他说是说不清楚。改来改去,对杜甫有点儿把握不住了。我说,我给你背首现代诗人写的诗吧。也许,对你把握杜老祖宗有点儿帮助。“诱惑人的黎明/以玫瑰色的手/向草地赶来彪悍的马群/马蹄踏到了鲜花/鲜花依旧抱着马蹄狂吻/就像我被人抛弃/却依旧爱着抛弃我的人。”诗的作者是谁我记不清楚了。但这诗句,却深深地烙在我的理智上。我问韬光,这有点儿像我们的杜老祖宗吗?韬光显得有点兴奋,眼中的暗淡突然变得清澈起来。我们又聊了几句别的,他越来越显得有点不稳重,丢下我给他的盒饭,就匆匆离开我的办公室。此后,在不短的时间里,再也未见他的影子。再见面时,人显得更消瘦了。他说,大哥,我能改的地方,都改过了。稿子没拿过来,送两位老师那里去审读,把关了。

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若要使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并能成为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学作品,那更是难上加难。一般情况下,作为学术工作者的先生们对后辈晚学不会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不幸的是,亦是有幸的是,韬光遇到的这两位老师都不是那种对自己的眼格降低尺度的人。两位先生不仅亲自动手给作品修改了不少的地方,并且还像有预案一样,每人给作品提出一百多条意见。我见过如我辈不分场合与对象好为人师者,更领教了在任何场合都严肃认真、乐为人师的二位先生。说这话有点儿开玩笑。二位先生不要为我的嬉戏而生气。在某种场合下,嬉戏也许尚能标示出良知还没有全然消失。都什么时代了,两位先生“迂”呀。那么多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老还何必要把两只眼再加上心上的那

我曾问过韬光,为什么要如此认真地来修改自己的文字;曾问过孙荪、葛景春二位先生,为什么要如此认真的“把关”;也曾问过我们两位编辑张丽和杨莉,为什么在诸多编辑都厌烦作者翻来覆去修改的情况下,你们却不厌其烦的帮作者来梳理改得如天书一样的文字。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涉及对杜甫老祖宗的敬畏,对文章千古事的虔诚执信。如是我闻,有敬畏,多一分敬畏就会少一分亵渎。在不少人都轻率地抛弃自己文字的今天,还有这么一群人执着于文字写作的笨功夫,这确确实实给了我不少的启发。我想,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虽然并不全然就是真理,但在轻率与草莽文字充斥文坛的今天,它的价值和意义,还是会彰显出来,还是须张扬一下的。

怀念周政

楚江 浏览报端惊告, 周公驾鹤赴天宫。 精诚报国同侪敬, 廉洁奉公吾辈崇。 民主作风能集思, 和谐态度便沟通。 平生不计名和利, 两袖清风见马翁。



新疆天山云海风光 杨光 摄影

● 郑州地理

城区以村名命名的路名

朱坤杰

以村庄命名路名是很多城市约定俗成的通用做法。每座城市的发展都是一个或多个村庄长期演变而来的,城市之根就是村庄。所以,村名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往往实体变化了,而反映历史文化的信息还存在,为延续这种历史和文化,很多城市会在改造村的原址以村庄命名一些路名。在郑州城区以村庄命名的路名中,有一些历史比较久远且文化底蕴深厚的改造村庄名。比如:祭城是郑州古地名之一,有3000多年的历史,并留有不少历史典故;凤凰台、圃田都是有数千年历史的村庄,“凤台荷香”、“圃田春草”都列为郑州古八景;南阳寨是由南杨寨演变而来,是郑州比较大的村寨,因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在此而出名;二里岗、杜岭不仅村庄古老,而且以发现郑州商代遗址而名声大振。由此可见,命名祭城路、凤凰路、圃田(南、北、西)路、南阳路、二里岗街、杜岭街等路名,对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确实起到很好的载体作用。

● 绿城漫步

陇海路那些蔷薇

尚新娟

几年前十月的一天,老家的一辆车捎我过来,将我丢在陇海西路这条干道上。看着它随即毫无牵挂地疾驰而去,如一沉重的物件,我不知将自已搬到哪里。 省城对于我的记忆几乎是个空白,也是个迷宫,对它的认识寥寥,省城人的熟面孔也仅是说过的几个。 初中时的地理课本上写着,省城有两条铁路动脉经过,一条是南北走向的国家大动脉京广线,一条是东西走向的铁路动脉陇海线,陇海路因之而得名。与铁路线一样,它与另一条京广路相交。 一个人几年的光阴就在陇海西路上的一家单位驻扎下来。 最初的念想,像一只彩色气球,每天上班的路上都拽着这样一只气球。 即使有时会泄气,朋友都会充当我的打气筒。他们和我一样把未来抱在心里,最常送我的礼物也是这样的气球。一只被现实的利器戳穿了,另一只完好的就马上搬在我的手心里。 他们不肯让我的天空失落。大地可以陨落,天空却不能陷于绝境。 以陇海路为中心,我的住处曾经每隔一个时期摇摆于附近。几次迁徙,改变了我的观望外界的目光,像一股被断开的水流,总能很快与新的水塘融为一处,共享这里的天光云影。我喜欢每处称之为家的地方,没过几天,周围的气息很快就消融掉我身上的生疏感,它们一个个亲近地聚拢过来。周围的邻居,窗外的女贞泡桐,房主留下的弱小盆栽,都在我身边形成新的陪伴。 熟悉又失去。旧去,新又来,这一切变换着我的四时,在变化中顺应,顺应也是某种坚守。 命运似乎从青春时就开始了。20年前,部队的一个炊事兵兄弟,操着满口棒子味的山东腔,对前来探亲的我叹服道,嫂子,你的适应能力很强啊。 你应该早来省城十年。我所敬重的一位长兄说。 起飞的确有些晚了,这使我的起步显得凌乱,滞重。但每一个阶段都是之后的铺

垫,自有它的获取与闪光,何必后悔以往的岁月。

单位所在大厦的前后停满了车辆,连行道树都为之让位。想必这二十米长的道旁原来不是光秃秃的吧,可能因为停车的需要才成为今天这样子。从内心里并不喜欢,尤其是夏天上班,从路南过十字走过来,再向西,穿过院子,这长长的几十米一直暴露在毒辣的太阳下。这一切都是大厦的威仪所至吧。 休闲时,我更愿从大厦出发,朝东散步。不远处是一个银行。我所有的生活费用都是从这里支出。再向东,是滨河公园,挨着公园的是工大。路边的花从春天开始,就不间断地开开落落。紫薇,丁香,辛夷花,再就是一穗一穗淡紫的泡桐花。 到了五月,当那些花不见踪影的时候,眼前忽现了堆满墙头的粉蔷薇。怯怯的,悄悄的,纷繁杂沓而至,将铁围墙装扮得异常少女。五月的轻风拂面而行,便有了一段不自觉的风流。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曲《蔷薇蔷薇处处开》,如同歌中所唱“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一样蔓延全国。它的曲调,加上邓丽君小姐的歌喉,带着陌生的自在,享乐和莫名的麻醉。新异诱人,尝一口便整个沉湎进去。当时的传唱,带着解禁后的兴奋。那时的我对这类歌曲还显懵懂,更愿哼唱的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它格调皎亮,凛然正气。在陇海路上,看不到原野,看到的是铺满锦绣的蔷薇,它们拥挤挨挨商量着,笙箫鼓乐地排一场节目,一派扑面而来的热闹。又如古时候的戏伶,地位卑微又努力活出繁华。 站在它们面前,所有经历的仆仆前尘,烟云般淡然后退。 宛若一条长长的花廊,自此,我的脚步每每流连于此,心里无声地诞生出花蕾般的情愫,若这密实繁复的蔷薇,次第探出了头。 这是陇海路的后花园。苍白的在这里得到填补,荒芜的在这里找到绚丽。它平复了你心口的荆棘,使得你的心扉春风怡然,暗香浮动。抑或,面对再一次袭来的邓丽君,你侧耳倾听那首歌时,可以听到生活的隐喻。



沿江乐 李金明

这本书是法拉奇的处女作,早在1958年就写出来了,但最近才刚刚在中国大陆出版。在书中,法拉奇用她手术刀般的文字,忠实地再现了一群绝世名伶的荣耀与糜烂,摊开了资本与娱乐纠缠与纠缠的真实画面,为我们进一步揭开电影和美国、成功和失败的谜团是不无助益的。 法拉奇的文字总是能给人一种鲜明的个性和气息,因为她从来就是毫不掩饰地把自己色彩鲜明的感情、锋芒尖锐的评判置于报道和创作

● 新书架

《好莱坞的七宗罪》

华丹

之中。是的,法拉奇对好莱坞也是毫不客气。在掀开了好莱坞的“画皮”之后,她还不忘给它取了个好名字——《好莱坞的七宗罪》。“七宗罪”之说,来自于《圣经》,具体指的是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傲慢、嫉妒和暴怒。在天主教中,这“七宗罪”可是要遭永劫的

啊。 今天,我们也进入了一个“娱乐当道”的文化时代,比之20世纪50年代的好莱坞,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法拉奇的笔下,金·诺瓦克并没有那种令男人们倾倒的“客厅淑女加闺室荡妇”的气质,她会的就是用眼神“传递性的

信息”。陈冠希告诉我们的糜烂的艺人生活,那个时代的好莱坞也早就有了,绯闻、交恶、结婚、外遇、离婚、再结婚、又离婚,还有自杀……几乎是无处不在。 好莱坞造星,是“像缝制裤子一样”打造出来的。“把你们的嫂子或者妈妈送来,如果我需要,我也可以把她们打造成女明星。”皮革马利翁已经说得够直白了。中国的娱乐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似乎正在重复着好莱坞昨天的故事……

连载

蔡德贵: 刘少奇您接触过吗? 季羨林: 刘少奇没大跟他接触,不知道干什么。他这种场合,他也(不大出席)。他那时候,不是彭真讲的吗?两个主席,国家主席是刘少奇,党的主席是毛泽东。彭真,他是说分为两派,一派是井冈山,一派是国内做地下斗争,井冈山党的地下党,后来怎么刘少奇一下子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了。后来我说,前一天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一下子变成叛徒、内奸、工贼。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针对刘少奇的,那是打倒刘少奇。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了。 蔡德贵: 您跟周恩来的交往也不算很多啊。他不是也在德国待过? 季羨林: 嗯,不多。(周恩来)在德国和法国都待过。 蔡德贵: 您跟朱德还是哥廷根大学的校友呢。 季羨林: 对。他在哥廷根待过。我谈过美人,我谈《红楼梦》,查一下曹雪芹对美人的界定,没有找到。林黛玉是美人,但是没有具体描写。对于林黛玉: 只说她眉毛比较绿(冒烟眉);对薛宝钗: 说她唇不点而红,唇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对迎春: 说她微胖且白;对探春: 说她削肩细腰,个子较高,鸭蛋脸;对凤姐: 说她丹凤眼,柳叶眉,身材苗条;对于贾母的亲戚史湘云,曹雪芹使用了八个字来形容: 蜂腰、猿臂、鹤势、螂形。这八个字,有两件事没有讲: 脸没有讲,腿没有讲。没有讲,是缺陷。《红楼梦》里对其他人的美,都没有具体的描写。其实美人应该是脸白、腰细、腿长,有这三项,一闭眼,眼前就是一个美人。一想这三项,美人就出来了。实际上美人没法描写,美人姿态也画不出。毛延寿死得有点冤。 张颂京: 现在讲美,是思想美。 季羨林: 要里外结合,都美。 蔡德贵: 您在《病榻杂记》里提到苏东坡的词所描写的美人。 季羨林: 苏东坡的词收在《十大名家词》里。 张颂京: 古人谈美人是: 杏眼、柳眉,樱桃小口,如果真那样,也不一定就美了。 季羨林: 世界上都喜欢讲美人,但是西词典里没有美人这个词。英文、法文都没有。西施是历史上的人物,而嫦娥,我们则把她送到月亮上去了。送去就回不来



李商隐在《嫦娥》一诗中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月亮上什么都没有,要谈恋爱都没有月亮。 张颂京: 宋庆龄是不是美人啊? 季羨林: 宋庆龄认识,解放初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招待印度大使。与她有过交流。她和宋美龄姐妹两个判若两类人。宋庆龄是很高贵的,大炼钢铁的时候,她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架起一口锅,弄来一个炉子,也开始大炼钢铁。 蔡德贵: 现在是不是该谈北大

了? 季羨林: 我去北大是陈寅恪介绍的,当时胡适不在国内。汤用彤文学院长,兼管这个学院的,那时候北大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北大六个学院,汤用彤是文学院的院长。不是院务委员会主席,我不知道。反正我去见汤用彤,在路上走的时候,中间有傅斯年,傅斯年是北大的副校长,代理校长。胡适的校长。路上走,他主要介绍北大这个门槛怎么怎么难,讲到别的大学教授要进北大,要降一级,教授改成副教授。就是这个门槛高。反正是我这一路上,就讲这个玩意儿。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当然出我意外啊,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当时我这个,你要说我没有资格,我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这是1946年了。 蔡德贵: 德国没有博士吗? 季羨林: (德国)没有这个名字。不过德国有一个,一个是拿了博士以后,就是doctor,拿第二个博士,就是habilitation,这个habilitation就可以当教授了,也可以当副教授,也可以当教授。没有habilitation,一个博士doctor,不行。这个制度啊,别的国家没有。 蔡德贵: 那就是德国唯一